

几经打磨的敦煌学精品著作

——读刘进宝《敦煌学通论（增订本）》

赵大旺

（南京师范大学 社会发展学院，江苏 南京 210023）

刘进宝教授的《敦煌学通论（增订本）》近期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①该书是在2002年版《敦煌学通论》（后文简称《通论》）的基础上增订而成，是对敦煌学进行全面介绍的通论性著作。作者用近50万字的篇幅，全面概括了百余年来中外敦煌学研究的主要成果，读来使人受益匪浅。下面笔者在简要介绍全书主要内容的基础上，谈谈学习该书的心得与体会。

一、《敦煌学通论（增订本）》的内容

敦煌学的内容博大精深，所涉及的学科范围非常广泛，因此，对它进行总体把握和精准概括并非易事。早在20世纪50年代，姜亮夫先生出版了《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60年代，苏莹辉先生出版了《敦煌学概要》，两书都是较早的敦煌学通论性著作，^②在当时学术信息不畅通的条件下，两位先生从事敦煌学通论性著作的撰写，筚路蓝缕，体现了深厚的学术功力，但由于条件的限制，两书都远非对敦煌学的全面介绍。

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深入，尤其到了20世纪80年代，敦煌学进入蓬勃发展的黄金时代，学界迫切需要一部全面系统地论述敦煌学的专著。1991年，刘进宝教授出版的《敦煌学述论》（后文简称《述论》）是当时比较全面系统论述敦煌学的第一部著作，填补了敦煌学研究中的这一空白，得到学界的广泛好评。台湾洪叶文化事业公司和韩国Acanet出版社还分别出版了中文繁体本和韩文本，可见其影响之广泛。2002年，刘进宝

收稿日期：2020-06-08

作者简介：赵大旺（1989-），男，江苏泗阳人。历史学博士，讲师，主要从事敦煌学研究。

① 刘进宝《敦煌学通论（增订本）》，兰州：甘肃教育出版社，2019年。

② 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苏莹辉《敦煌学概要》，台北：学生书局，1964年。

教授将《述论》增订后以《敦煌学通论》为名，收入季羨林先生主编的“敦煌学研究丛书”，由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得到了学界颇多好评，成为读者全面了解敦煌学的重要参考书，也是很多高校教师开设有关敦煌学课程的重要参考书。2011年，刘进宝教授以《通论》为基础，修订后以《丝绸之路敦煌研究》为名在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到这次出版《敦煌学通论（增订本）》，时间已过去将近30年，本书也经历了四次修订再版，可见该书已成为经得住时间检验的精品著作。

新世纪以来的20年是敦煌学飞速发展的20年，也是本书作者学术日益精进的20年。相对《通论》问世的本世纪初，学界对许多问题有了更深的理解，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研究课题。而随着敦煌学研究的日益深入，其概论性著作理应不断更新与完善，作者在此时推出《敦煌学通论（增订本）》，介绍新成绩，探讨新动向，正是新时期敦煌学术发展所迫切需要的。作者在这次增订本中做了较多的修订、增补，这从篇幅上就可以直观反映出来：《述论》共28万字、《通论》40万字，而这次的增订本则达到近50万字，在内容的深度、广度上都较前一版有很大的进步。

从增订本内容来看，本书在保留《通论》体例结构的基础上又作了微调。全书共设五章，并增加了《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作为“引言”。

本书作者近年来较多关注近代敦煌学学术史的宏观思考，注重将中国近代学术与当时的世界形势与国际学术潮流联系起来，探讨学术发生的深层背景，作者的这一思考已取得系列的成果。^①就“敦煌学”而言，作者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着西方对东方的殖民侵略，“东方学”在西方兴起，历史比较语言学成为当时世界学术的主流，在此背景下产生了“埃及学”“印度学”“西夏学”等名词，“敦煌学”也是在这一背景之下产生的。作者认为“敦煌学”虽然是在西方殖民背景下提出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其科学价值。以此作为全书“引言”有助于读者对“敦煌学”一词产生的背景和原因有更深入的理解，也深化了读者对敦煌学的认识。

第一章《千载沧桑话敦煌》以时间为序，介绍了先秦至明清时期敦煌的历史，展现了敦煌作为“丝绸之路”交通枢纽兴起、繁荣和衰落的千年历程。本书作者从事隋唐史、敦煌学研究三十余年，在唐宋之际敦煌归义军经济史研究上取得过卓越的成就。因此，本章尤其以隋唐至归义军时期篇幅最多，这是敦煌历史上最繁荣的时期，同时，由于敦煌文献的发现，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资料也最丰富，作者对这一段时期的论述也最深入。本章还较多吸收了近年来甘肃地方史的研究成果，对《通论》中论述薄弱的宋至清代敦煌历史作了增补，从而将敦煌古代史贯通叙述。本章展示了敦煌古代历史的发展过程，也反映出敦煌在整个中国古代史中的地位，读来使人对这个偏处边陲、正史对

^① 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丝绸之路”》，《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15年第4期；刘进宝《东方学视野下的西北史地学》，《社会科学战线》2017年第4期；刘进宝《东方学背景下的敦煌学》，《敦煌研究》2017年第3期。

其少有记载的西北小城有更深刻的认识。

第二章《艺术瑰宝千佛洞》介绍敦煌莫高窟的石窟艺术，主要分为莫高窟的创建、壁画艺术、彩塑艺术、建筑艺术四个方面，展现了莫高窟作为一个综合性艺术宝库的巨大价值。在综合介绍段文杰、孙纪元、孙儒倜等人对敦煌艺术的研究成果时，作者还注重探讨敦煌艺术作品对历史研究的价值，作者认为，“敦煌壁画是一部形象化的历史”，“从总体上说，敦煌壁画是通过间接和直接两种方式反映现实社会的。”（181页）“壁画上不仅图画其仪容，而且还有供养人题记，……直接地反映着现实人物及其活动，是具有较高历史价值的，有些甚至可以填补历史研究的空白。”（182页）

第三章《扼腕愤谈伤心史》介绍了藏经洞发现和藏经洞文物流散的过程，展现了一部扼腕叹息的我国学术“伤心史”。本章专门探讨了藏经洞封闭原因这一“千古之谜”，详细梳理前人关于藏经洞封闭原因的5种学说。作者在本章着重介绍敦煌文物流散情况，探讨了外国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鄂登堡、华尔纳等人在敦煌考察、盗取敦煌文物的过程，以及被盗文物在世界各地的收藏情况。没有被外国探险家带走的劫余文献，很多也流散于国内私家之手，最后只剩8000余号敦煌写卷入藏京师图书馆。作者细致梳理了敦煌写卷在国内流散民间的情况，以及京师图书馆收藏敦煌写卷的过程。作者认为，敦煌文献流散是西方殖民侵略大背景下的产物，但也有很多具体原因，如中国政府的昏聩无能、国人的思想麻痹和愚昧无知、外国探险家的个人素质，以及当时社会缺乏文物的主权意识等。五四运动以后，随着不断高涨的反帝爱国运动，文物的主权意识才逐渐产生，如1926年，中国学术界联合组成“中国学术团体协会”，制止了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带走中国文物。1930年南京政府立法院制定《古物保存法》，标志着全社会文物主权意识的加强。

第四章《敦煌遗书》主要介绍敦煌文献的学术价值，全面叙述了敦煌文献在历史学、宗教学、文学、科技史等方面的巨大研究价值。作者认为，敦煌文献在诸多领域中提供了许多新资料，推动了学术研究的进展，并填补一些前人研究的空白。以历史学研究为例，魏晋至唐宋时期官府档案早已荡然无存，敦煌所保存的资料是这一时期仅存的档案，有的可以补充史料记载的不足，有的可以纠正史籍的讹误，在西北边陲史地研究方面更是填补了历史的空白。如关于唐代均田制是否实行的问题，学界有过激烈的讨论，根据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可以确定唐代均田制确实施行过。（362页）又如，玄武门之变中，李世民为何能夺取玄武门的控制权，学界长期不得其解，而根据敦煌文书P.2640《常何墓碑》，可知太宗在玄武门之变中得到了守门将领常何及其所领宿卫兵的支持，从而能够提前在玄武门内埋伏。（364-366页）作者认为，将敦煌文书与史籍文献综合研究，必将会促进历史研究的发展，也会开拓敦煌学研究的新局面。（372页）

第五章《敦煌学研究遍天下》主要介绍近代以来中外学者研究敦煌学的历程。作者将中国敦煌学的起点定在1909年，并探讨各个时期中国敦煌学的特点及其贡献，作者认为，文革前我国的敦煌学研究“虽然各个时期研究的侧重点不同，但都取得了一

定的成绩，并在许多方面，如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学理论等，都一直走在世界的前列，为我国敦煌学研究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504页）80年代以后，我国敦煌学研究“发表了系列或总结性研究成果，有些甚至代表了国际敦煌学研究的最高水平。”（571页）敦煌学是国际性的学问，大量海外学者也对敦煌学研究作出过突出的贡献，本章既用专节重点介绍了法国、日本等敦煌学研究重镇的主要成果，又扼要介绍其他国家（俄罗斯、英国、美国、韩国）的敦煌学研究状况。作者还指出，21世纪的敦煌学研究，敦煌文献整理校释取得了较好的成绩，国际合作与交流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

通过以上对全书内容的介绍可以看出，本书的内容较为全面，涉及历史、地理、语言、文学、宗教、考古、艺术、科技等敦煌学研究的各个主要方面，既关注国内学者百余年来研究成绩，也注意介绍国外学者的贡献。郝春文先生在本书《序言》中说：“通论应主要反映学术界的共识。所以凝练和概括共识是通论撰写者的重要基本功。”（2页）本书涉及的内容较为丰富，但作者叙述有条不紊，即便是作者并不专门研究的文学、艺术、宗教、科技等领域，也能够系统地引介相关文献及经典著作，具有较高的概括性，体现作者对各相关著作进行过细致认真地学习，并提炼、综合后加以通俗地叙述。作者还将写作所参考的主要资料标注在每节的末尾，既是表彰前人的研究成果，也提高了本书叙述的可信度，方便感兴趣的读者参阅其它相关著作。

二、学习《敦煌学通论（增订本）》的体会

本书虽是一部通论性的著作，但经历作者20余年的披阅增删，凝聚30余年学术耕耘的辛勤汗水，几经打磨，已经成为一部经得起时间检验的精品著作。本书内容涉及面较广、介绍内容也较深入，语言通顺流畅、叙述系统生动、逻辑清晰严密，从而具有较高的可读性。非专业的爱好者可以从中获得对敦煌学的基本认识，即便是专业的敦煌学研究者和学习者，也可以从中吸取学术的养分，启发专业的学习与研究。以下，笔者从专业学习者的角度谈一下学习本书的感受。

第一个感受是本书在引用资料的可靠性上体现了作者治学的严谨认真。本书引用了大量的原始文献，资料来源较为广泛，包括传世史籍、出土文献、档案资料、近代日记书信等。在《述论》《通论》出版时，由于研究条件的限制，书中所引资料有些未能找到原文核对，而且按照目前严格的学术规范来看，当时的大部分注释也较为简单。本次修订，作者在核对引文、规范注释方面作了大量的工作。《述论》《通论》的注释附在每章之后，不便参阅，在修订本中，作者修改了注释体例，将注释改为页下注，而且引文更加规范、清晰，引用的原始文献基本都注明了版本、页码。书中还引用了大量的敦煌文献，也都注明了图版的出处，由于作者对每一件敦煌文书都仔细核对了图版，因此，书中引用敦煌文书的录文准确度较高。此外，还有一些不常见的材料，前人在使用时往往因袭旧注，因此注释或过于简单，或信息有误，导致无法根据注释找到原文。如

姜亮夫先生《莫高窟年表》中引用1909年学部致甘肃电文：“行陕甘总督，请饬查检齐千佛洞书籍，解部。并造像古碑，勿令外人购买”，注明出自《学部官报》第104期。^①此后学者引用该材料大多转引自姜亮夫先生。但仔细翻检《学部官报》第104期并未找到本条引文。本书作者根据《学部官报》第104期原书，将引文订正为：“敦煌县东南三十里三危山下千佛洞石室储藏唐人写本书籍甚多，上年经法人伯希和亲赴其地，购获不少……即希遴派委员迅往查明现共存有若干，无论完全残破，统行检齐解部，幸勿遗失散落，所需运费由部认还，此外各洞中造像、古碑亦颇不少，均属瑰异之品，并希派员详细考查，登记目录，咨部存案，勿再令外人任意购求，是为至要。”（340页）从作者订正后的引文看，姜亮夫先生的引文似为电文的节录，而不是原文。又如，《通论》引用元代刘谧的《三教平心论》，系转引自段文杰先生《晚期的莫高窟艺术》，此次修订，作者找到《大正藏》第52卷所收原文，并改正了原引文的错误。（160页）如此之类，不胜枚举。从这些修订工作可以看出作者力求使用一手资料，重视史料的真实可靠，体现了严谨认真、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

第二个感受是本书作者涉猎领域广泛，对历史学之外的很多领域有较深刻的认识。敦煌学包含内容庞杂渊博，只有对相关学科都能有较深入的了解，才能撰写出一部优秀的敦煌学通论性著作。《述论》出版的1991年，学界还没有一本全面的敦煌学概论性著作，即便是到今天，敦煌学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但目前已有的概论性著作，或是针对敦煌学的某一方面，如《敦煌文学概论》《敦煌石窟艺术概论》《中国敦煌学史》等，^②或是集合各方面专家，成于众手，如郝春文先生主编的《敦煌学概论》、李并成先生主编的《敦煌学教程》等。^③个人独自撰写的全面介绍敦煌学的著作并不多。^④本书作者从事敦煌学研究30余年，虽然主要精力放在历史学方面，但作者很早就认识到：“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的学问，在研究中又会常常涉及到研究者专业以外的学问，甚至会是多学科的碰撞。因此，在以后的研究中，史学要与文学、语言学、宗教学等学科相互学习借鉴，尽量多了解一些其他学科的研究状况，从而使我们少走弯路。”^⑤从本书内容看，作者也将这一认识贯彻到了本书的写作、修订过程中。本书中专辟一章介绍了敦煌艺术，虽然本章主要是提炼前人研究成果，但也有不少作者自己的心得，如作者指出，“敦煌艺术，既不是西来的，也不是东去的，而是中国古老的传统文化在敦煌这个特殊

① 姜亮夫《莫高窟年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622页。

② 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93年；郑炳林、沙武田编著《敦煌石窟艺术概论》，兰州：甘肃文化出版社，2005年；林家平等著《中国敦煌学史》，北京：北京语言学院出版社，1992年。

③ 郝春文主编《敦煌学概论》，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年；李并成主编《敦煌学教程》，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年。

④ 除本书外，还有李正宇《敦煌学导论》，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2008年；荣新江《敦煌学十八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⑤ 刘进宝《从“唱衣”研究看学术研究的困难》，《社会科学战线》2008年第11期，第100页。

的地理环境中与外来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只有从这个大前提出发，才能正确阐述敦煌艺术产生的历史、文化背景。”（57页）又如第四章介绍敦煌文献的研究价值时，作者不仅谈了敦煌文书与历史研究的关系，还介绍了敦煌文书中的宗教学、文学、科技材料。对于宗教学中的“疑伪经”，作者认为，“中国人撰述的经、律、论、章、疏，反映了中国的佛教特点，是研究中国佛教史的宝贵资料。”（377页）这和方广钊等先生的观点恰相呼应：“疑伪经实际上反映了印度佛教怎样一步步地中国化，从而对中国佛教研究具有重大意义。”^①宗教学方面还分别介绍了道教、景教、摩尼教、火祆教的资料，充分展示了敦煌文献中宗教文献的概况。作者还以敦煌寺院生活中的“唱衣”活动为例，示范了将敦煌文献与传世史籍、佛教文献综合运用，来研究中国古代的佛教生活。在介绍敦煌文献与文学研究时，作者也能够广泛征引敦煌文献中的文学作品和相关研究，生动具体地展示敦煌变文、诗歌、曲子词等文学体裁的概貌，及其对中国古代文学史研究的推动作用。总之，作者在充分吸取前人在敦煌艺术、语言、宗教、科技等方面研究成果的同时，在很多方面都体现出了卓越的见识。

第三个感受是本书不是单纯叙述的通论性著作，更包含作者的学术研究和在研究中的思考。如引言部分将“敦煌学”一词的产生放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国家殖民侵略的时代背景和“东方学”成为国际学术潮流的学术背景中考察，敏锐地指出“敦煌学”一词所具有的殖民主义的成分，使韩儒林、周一良等老一辈学者对其怀有复杂的心情，也引起了“敦煌学”要不要带引号的讨论。（第16页）如果不了解作者所指出“敦煌学”产生的时代背景，我们这一辈人恐怕很难理解韩儒林、周一良等老先生对“敦煌学”的复杂心情。又如，我们熟知王道士发现藏经洞的事，但很少有人讨论佛教石窟莫高窟为何由一位道士住持呢？作者认真思考并回答了这一问题：元代以后，敦煌就成了佛道交融之地，敦煌的道教到清代仍有一定势力，清代重修莫高窟时也增添了不少道教的内容，而当时民间对佛道的区分已不明显，加上王道士会说汉语，诵读的也是汉文道经，能满足大部分群众的需求，因此，王道士能够得到当地百姓的信任并居住佛教洞窟。中国近代敦煌学史是作者近年来一直关注的课题，在本书的修订过程中，作者加入了许多这方面的最新成果。如关于向达与西北史地考察团，作者近期有两篇专文探讨，^②在修订本书时便加入了最近的研究成果，从而使读者对向达在考察团内的处境、向达与张大千的关系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揭示了早期敦煌学研究者们在艰苦条件下从事研究的坚毅品格。又如，作者近年主持并以“优秀”的鉴定结果完成了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敦煌史部文献整理研究”，对敦煌文献的进一步整理有诸多思考。作者认为，目前敦煌文献资料的刊布已基本完成，而敦煌文献的整理校释则还需要进一步深

^① 方广钊、许培玲《敦煌遗书中的佛文献及其价值》，《西域研究》1996年第1期，第48页。

^② 刘进宝《向达敦煌考察的身份问题研究平议》，《中华文史论丛》2016年第2期；刘进宝《向达与张大千——关于张大千破坏敦煌壁画的学术史考察》，《中华文史论丛》2018年第2期。

人，由于写本形态、西北方言方音等客观原因，给阅读和使用敦煌文献带来很多困难，因此，影印本的出版还不能满足敦煌学进一步深入的需要，“只有将敦煌文献做成二十四史点校本这样的定本，才能使敦煌文献走出敦煌学的圈子，真正融入学术界，使不专门从事敦煌学研究的学者，能够像使用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样使用敦煌文献，敦煌文献也就会成为像二十四史、《资治通鉴》那样的史料。也只有这样，敦煌文献才能真正发挥其价值。”（608-609页）作者认为，敦煌学是一门国际显学，但“专门研究者以外的文学、史学、艺术工作者和文科研究生、大学生等，都对敦煌学比较陌生，更不要说一般群众了。”（614页）从这个角度说，作者提出将敦煌文献做成“二十四史点校本这样的定本”，正是为了普及敦煌学，让敦煌文献在各学科充分发挥作用，一方面达到繁荣敦煌研究的目的，另一方面也使敦煌学尽快从学术界走向全社会。

以上介绍笔者在学习《敦煌学通论（增订本）》时的一些肤浅感受，但从中不难看出该书在内容的深度、广度上恰到好处，适合不同层次的敦煌文化爱好者、研究者阅读。作者提出对敦煌学应当“加强宣传、普及工作”，（614页）本书的多次修订就是作者对这一理念的忠实践行，相信本书的出版会对敦煌学的普及发挥重要作用，推动敦煌学进一步对人文社会科学各个领域作出贡献，并进一步走进社会，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国家当前的“一带一路”倡议贡献力量。